

宋克夫自选集

元明清文学考论

宋克夫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宋克夫自选集

元明清文学考论

宋克夫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元明清文学考论：宋克夫自选集 / 宋克夫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9

ISBN 978 - 7 - 5203 - 4903 - 1

I. ①元… II. ①宋…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元代—文集
②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明清时代—文集 IV. ①I206.4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84084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刘志兵
责任校对 李 莉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9.75
插 页 2
字 数 501 千字
定 价 13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宋克夫，湖北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享受省政府专项津贴专家，湖北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出版专著《宋明理学与章回小说》《心学与文学论稿》《宋明理学与明代文学》等六部，主编论文集、教材三部。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六十多篇。多次获得湖北省高等学校教学成果奖和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自序

文学研究实质上是对文学现象进行文学判断。文学判断主要有两种方式：一为事实判断，一为价值判断。自选集名曰《元明清文学考论》，其中所谓“考”，即考证，着眼于事实判断；所谓“论”，即论析，着眼于价值判断。而在文学研究中，事实判断是基础，价值判断是提升。

文学研究必须建立在真实可靠的文学事实基础之上，而弄清文学事实的主要方式就是考证。尤其是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考证应该是基本功。在元明清文学研究领域，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胡适的《章回小说考证》堪称现代戏曲小说研究的奠基之作，在戏曲小说研究领域，奠定了学科的基础，一直影响到现在，而且直到将来的戏曲小说研究。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研究中事实判断的价值是永恒的。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在我的学术生涯中，重视以考证的方式，对文学现象进行事实判断。自选集中所收录的《诸宫调体制源流考辨》《从〈张协状元〉和宋代曲体的关系看戏文的起源》《正续〈小五义〉作者考论》《宋濂朱学渊源考》《唐宋派考论》都是着眼事实判断，对元明清时期戏曲、小说及诗文中的文学现象进行实事求是的考证。即使是一些以论析为主的文章，如《吴承恩与明代心学思潮及〈西游记〉的著作权问题》《徐渭与唐宋派》《徐渭与阳明心学》等，也是在考证了基本事实的基础上进行论证分析。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注重宋明理学与元明清文学关系的研究。而在论证宋明理学与元明清文学关系时，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就是考证明代文学作家和宋明理学的关系。如《论〈风云会〉的“尊王贱霸”倾向——兼论罗贯中的理学思想》《宋濂朱学渊源考》考证了罗贯中、宋濂与程朱理学的关系；《吴承恩与明代心学思潮及〈西游记〉的著作权问题》《论唐顺之的天机说》《徐渭与阳明心学》等，考证了吴承恩、唐顺之、徐渭与阳明

心学的关系，在考证基本事实的基础上，再论宋明理学对明代作家创作的影响。

价值判断是文学研究的另一重要方式，而价值观念在不同时空条件下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从“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到当下全球皆是孔子学院，近百年来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种变化引发我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人类是否有终极价值？如果有，这个终极价值又是什么？纵观人类的历史，人类活动的目的即在于作为整体人类的发展与幸福，而这即应该是人类的终极价值。古代即有“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现代提出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所表达的就是这一思想。因而，在我的学术生涯中，始终把整体人类的发展与幸福作为文学研究的终极价值。并以此为基点，建构自己的文学价值观。

在我看来，人类历史，实际上是人类生存状态演进的历程；而文学史则是文学表现、反映及设计人类生存状态的历程。人类生存状态构成了文学的全部内容。一方面，价值观念决定着人的生存状态，同时，人格风范则是人的生存状态的典型体现。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和文学作品中的形象的价值观念与人格风范成为我进行文学研究的重点。自选集中所收录的《论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伦理特点和发展线索》《论章回小说的人格探索》《论章回小说中的人格悲剧》《主体意识的弘扬与人格的自我完善——孙悟空形象塑造新论》《人欲的正视与人生的困惑——〈金瓶梅〉价值取向论析》《论贾宝玉的悲剧心态》《贾宝玉性格的人性解析》《论徐渭的狂狷人格》《从理想的人格到理想的文格——论袁宏道对人生价值和文学观念的变革》《试论岳飞的悲剧性格——〈精忠旗〉悲剧特征研究之二》等，都是以相应的价值观念为切入点，分析创作主体和文学形象的人格风范。

我在1995年出版《宋明理学与章回小说》一书时曾提出：价值体系构成了哲学与文学这两种样式联姻的中介。一方面，哲学上的价值体系潜在地支配着作为文学观照对象的人的生活，作为对生活的观照，文学在反映生活的同时无疑还会反映潜在控制着这种生活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哲学上的价值体系又为作者认知、观照、表现社会生活和世俗人生提供了评价准则，左右着作者的创作过程，并进入文学载体。因而，我始终把宋明理学与元明清文学关系的研究作为我学术研究的重点。早在1983年，在《武汉师范学院学报》发表了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金瓶中的艺术辩

证法——读《第五才子书》札记》，即开始从哲学的角度研究文学。自选集中《论章回小说对宋明理学的超越》《宋明理学与章回小说的价值取向》《论〈风云会〉的“尊王贱霸”倾向——兼论罗贯中的理学思想》《吴承恩与明代心学思潮及〈西游记〉的著作权问题》《论晚明文学思潮消歇的原因》《王畿与中晚明文学思潮》《宋濂朱学渊源考》《何心隐人欲观论析——兼及中晚明人欲观之流变》《论唐顺之的天机说》《徐渭与阳明心学》《对于袁宏道“性灵说”的哲学思考》等，都着重探讨哲学与文学的互动，以及宋明理学与明代文学的关系。

今年，我年届花甲，这本自选集正好成为我一生从事学术研究的记录与见证。是为序。

目 录

自序	(1)
----------	-----

上篇 明清小说考论

第一章 章回小说论析	(3)
论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伦理特点和发展线索	(3)
论章回小说的人格探索	(15)
论章回小说中的人格悲剧	(28)
论章回小说对宋明理学的超越	(35)
宋明理学与章回小说的价值取向	(43)
进化论与《中国小说史略》	(52)
第二章 《三国演义》论析	(64)
论《风云会》的“尊王贱霸”倾向 ——兼论罗贯中的理学思想	(64)
论《三国演义》的思维方式 ——兼及《三国演义》的研究方法	(72)
论《三国演义》仁政思想的悲剧实质	(83)
在历史与伦理之间 ——从“庞统献策取西川”看《三国演义》的思维方式	(90)
论毛宗岗对曹操形象的评改	(97)
第三章 《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考论	(109)

乱世忠义的悲歌

- 论《水浒传》的主题及思维方式 (109)

金批中的小说艺术辩证法

- 读《第五才子书》札记 (120)

吴承恩与明代心学思潮及《西游记》的著作权问题 (129)

主体意识的弘扬与人格的自我完善

- 孙悟空形象塑造新论 (141)

人欲的正视和人生的困惑

- 《金瓶梅》价值取向论析 (153)

第四章 《红楼梦》《小五义》考论 (166)

- 论贾宝玉的悲剧心态 (166)

- 贾宝玉性格的人性解析 (177)

- 正续《小五义》作者考论 (192)

中篇 明代诗文考论

第五章 明代诗文考论 (205)

- 论晚明文学思潮消歇的原因 (205)

- 明代万历前后的湖北文坛研究 (217)

- 王畿与中晚明文学思潮 (234)

- 宋濂朱学渊源考 (249)

何心隐人欲观论析

- 兼及中晚明人欲观之流变 (261)

第六章 唐宋派考论 (273)

- 唐宋派考 (273)

- 论唐顺之的天机说 (283)

- 徐渭与阳明心学 (295)

- 徐渭与唐宋派 (309)

- 论徐渭的狂狷人格 (327)

第七章 袁宏道“性灵说”论析	(344)
试论性灵说	(344)
对于袁宏道“性灵说”的哲学思考	(357)
从理想的人格到理想的文格	
——论袁宏道对人生价值观念和文学观念的变革	(374)
论袁宏道的通俗文学观	(385)

下篇 古代戏曲考论

第八章 诸宫调及戏曲考论	(399)
诸宫调体制源流考辨	(399)
从《张协状元》和宋代曲体的关系看戏文的起源	(412)
中西古典悲剧人物探异	(421)
第九章 《精忠旗》论析	(431)
试论《精忠旗》的悲剧冲突和主题	(431)
试论岳飞的悲剧性格	
——《精忠旗》悲剧特征研究之二	(442)
试论《精忠旗》的悲剧艺术	
——《精忠旗》悲剧特征研究之三	(454)
后记	(466)

上 篇

明清小说考论

第一章 章回小说论析

论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伦理特点和发展线索

我国古代，以伦理思想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构成了中国文化心理的特质，这一特质一方面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同时也严密地支配着人们的审美方式，这二者的碰撞给古代长篇小说留下了鲜明的伦理印记。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产生、发展并取得辉煌成就的明清时代，正是伦理观念发生急剧变革的时代。如果我们把古代长篇小说放在这广袤的文化背景中，从最能体现这种文化背景特质的伦理角度入手，对审美主体的审美方式、审美对象的基本特点作一个宏观的考察，也许能使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发展线索更加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

在真、善、美之间，如果说古代的西方人强调的是美与真的联系，那么，古代的中国人更着重的则是美与善的统一。在中国古代美学文献中，用以表述艺术和伦理关系的“美善相兼”之类的说法简直是汗牛充栋。美学思想和伦理思想、美与善从降临到人世起，就似乎有一种先天的血缘关系。中国古代美学的这一显著特点，体现在主体之于对象、艺术之于社会的审美关系上，形成了道德评价取代美学分析的倾向。而古代美学的这一传统对长篇小说伦理特点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古代长篇小说的审美过程中，伦理判断构成了审美方式的重要形式，而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伦理特点，首先在审美方式上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从创作过程上看，伦理判断直接制约着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小说作家运用的审美标准是道德的尺度，他们往往通过善恶标准来认识、评

价、反映社会生活，褒贬作品中的人物这一点，正如闲斋老人在《儒林外史序》中所言：

稗官为史之支流，若读稗官者可进于史；故其为书亦必善善恶恶，俾读者有所观感戒惧，而风俗人心庶以维持不坏。^①

在古代作家看来，“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②小说创作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善恶分明的艺术形象实现作品的伦理功能，使读书者“读到古人忠处，便思自己忠与不忠；孝处，便思自己孝与不孝。至于善恶可否，皆当如此”。^③而实现小说伦理功能的前提，就在于要求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一字予者，褒之；否者，贬之。然一字之中，以见当时君臣父子之道，垂鉴后世俾识某之善，某之恶，欲其劝惩警惧，不致有前车之覆”。^④小说作家只有评价、反映社会生活时运用道德的尺度，对作品中的人物进行鲜明的褒贬，才有可能形成作品善恶分明的伦理倾向，以实现作品惩恶扬善的伦理功能。

从接受过程上看，伦理判断直接地制约着主体之于对象的审美关系。在古代长篇小说的阅读、批评过程中，读者和批评家对审美对象的褒贬态度通常取决于伦理标准，他们往往用善恶的尺度去评价人物，表明自己对人物的爱憎背向。在对宋江形象的评价上，李贽和金圣叹的争鸣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中认为：

谓水浒之众，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可也。然未有忠义如宋公明者也。……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卒至于犯大难，成大功，服毒自缢，同死而不辞，则忠义之烈也！^⑤

① 闲斋老人：《儒林外史序》，曾祖荫、黄清泉、周伟民、王先需选注《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选注》，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168页。

② 绿园老人：《岐路灯序》，曾祖荫、黄清泉、周伟民、王先需选注《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选注》，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196页。

③ 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页。

④ 同上书，第1页。

⑤ 李贽：《忠义水浒传序》，刘幼生整理《焚书》卷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页。

李贽对宋江的高度评价，遭到了金圣叹的猛烈抨击。在《水浒传序二》中，金圣叹说：“后世不知何等好乱之徒，乃谬加以‘忠义’之目。”^①并在第十七回总批中说：

宋江，盗魁也。盗魁则其罪浮于群盗一等。然而从来之读《水浒》者，每每过许宋江多义。……宋江而诚忠义，是必不放晁盖者也，宋江而放晁盖，是必不能忠义者也。^②

在对宋江的评价上，尽管李贽和金圣叹的态度大相违背，然而，他们所运用的判断标准却是一致的，都是通过伦理准则对宋江作出自己的褒贬。在审美方式上，也都体现了古代长篇小说在接受过程中以伦理判断为其主要形式的共同特点。

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特质在审美心理上积淀的产物，审美过程中的伦理判断决定着古代长篇小说的伦理特点。一方面，伦理判断直接制约着小说作家的创作过程；另一方面，伦理判断又左右着主体对小说的接受过程，并通过批评和理论的形式，影响作家的审美方式，间接地支配着长篇小说的创作。因此，使古代长篇小说的人物形象、基本主题都呈现出鲜明的伦理风貌。

遗憾的是，在近几十年的文学研究中，人们对古代小说在审美方式上的这一显著特点并没有予以应有的正视，而习惯于把各种复杂的文学现象纳于政治判断的框架。于是，政治判断代替了美学评价，简单的阶级、历史分析成了古代小说研究方法的唯一模式。殊不知政治判断在古代小说的审美过程中并不起支配作用，阶级分析更难以左右古代小说的创作和接受。因之，审美方式在不同时空条件下所存在的差异和矛盾，使古代小说研究中的混乱局面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随之而来的是隔靴搔痒，难解人意的分析和喋喋不休，打不完的笔墨官司。如曹操形象的评价，《水浒传》的招安问题，《西游记》的主题，等等，这些小说史上复杂的文学现象依

① 金圣叹：《水浒传序二》，陈曦钟、侯忠义、鲁玉川辑校《水浒传会评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页。

② 陈曦钟、侯忠义、鲁玉川辑校：《水浒传会评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5页。

然将作为永久性的难题向人们发出不断的挑战。而对古代长篇小说伦理特点的注重,则是对近几十年文学研究现状反思的必然旨归。

每一部长篇小说都是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一方面是弥漫着以伦理精神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的古代封建社会生活的反映,同时也是主体以伦理判断为其主要审美方式对现实世界的观照。经过主体以伦理意识对充满伦理精神的社会生活评价、反映而创作的古代长篇小说,自然地要打上深刻的伦理印记。

这种伦理的印记,首先在古代长篇小说的艺术形象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艺术形象是主体根据一定的审美方式评价、再现生活的产物。由于伦理判断左右着主体的创作过程,古代小说的艺术形象也不可避免地染上了浓郁的道德色彩,呈现出鲜明的善恶倾向。伦理属性因而成为古代小说人物的本质特征。

这里姑且以聚讼近30年的曹操形象为例。从历史真实出发,有的论者认为《三国演义》“歪曲历史,贬斥曹操”,是“曹操的谤书”。出于对艺术真实的强调,有的论者认为曹操的形象“广泛地概括了长期封建社会的权臣、政治家的复杂而真实的精神面貌”^①,达到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统一。上述两种观点似乎根本对立,但在判断方式上却都是用政治历史评判取代伦理分析。从政治历史判断出发,曹操确实不失为一个雄才大略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但如果从伦理判断着眼,曹操则是一个欺世盗名、狡诈虚伪、凶残狠毒的奸雄。而在《三国演义》的创作过程中,作者是以伦理判断为其审美方式的:从“忠”出发,作品批判了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从“义”出发,作品揭露了曹操狡诈奸猾;从“仁”出发,作品鞭挞了曹操狠毒凶残。出于对历史的忠实,《三国演义》也确实描写了曹操“雄才大略”的性格和统一北方的大业,然而,这些为政治历史判断所肯定的性格大业,在道德的解剖刀下则往往显现出其欺世盗名、伺机篡位的丑恶灵魂。因而,着眼于伦理评判,历史上的曹操和艺术中的曹操并没有实质上的差异。造成曹操形象聚讼的根本症结,也不在于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之间的背离,而在于今人的政治判断和古人的伦理判断在观照历史和艺术中所形成的差异。

《水浒传》中的宋江是古代小说研究中另一个聚讼纷纭的人物。权威

① 宋培宪:《毛泽东与〈为曹操翻案〉》,《文艺理论与批评》1999年第6期。

性的意见认为：宋江的形象具有反抗性和妥协性的双重性格。最后，妥协性占了上风，从而酿成了招安的悲剧。这是用政治判断对宋江形象做出的分析。诚然，宋江的形象确实具有双重性格，但把这种双重性格归结为反抗性和妥协性，却不免失之于皮相。事实上，制约着宋江双重性格的本质属性，是在“官逼民反”的历史条件下两种伦理力量——忠和义——之间的矛盾。出于“义”，他担着“血海也似干系”，私放了晁盖。在擒何涛、俘黄安以后，他又着眼于“忠”，认为这是犯了“弥天大罪”，“于法度上却饶不得”。宋江一生都徘徊在“忠”“义”之间，一生都在寻求统一“忠义”的途径。最后，他终于找到了这样的途径，那就是接受招安。在宋江看来，只有这条途径才能在保证“忠”的同时，又顾及“义”，既“忠于大宋天子，尽忠竭力报国”，又可以使兄弟们“去边上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青史留名”。因而，受招安的结局，不是宋江性格中反抗性和妥协性分裂的产物，而是宋江性格在“忠”和“义”的表现上相互矛盾统一的结果。宋江形象因伦理特征和积极意义所构成的丰富性也正是在这里才得到充分的显示。

既然伦理属性构成了古代长篇小说人物形象的本质特征，那么，各种伦理力量的冲突就必然成为作品的基本矛盾。古代长篇小说往往通过善和恶的矛盾冲突，以及对善的讴歌和恶的批判，表现作品惩恶扬善的基本倾向，寄托作者各自的伦理理想。

正像伦理判断左右着艺术形象的创造一样，古代小说作家不是用阶级的眼光看待纷繁万变的人事关系和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而往往习惯于把这些关系和矛盾纳入伦理的框架，用伦理的观念加以解释。这种思维方式直接制约着古代长篇小说主题的形成。

《水浒传》的主题是古代小说研究中引人注目的热门课题。立足于阶级分析的“农民起义说”一向被认为是《水浒传》主题的定评。不错，《水浒传》是描写了梁山好汉和贪官污吏的斗争，也揭示了“官逼民反”的现象，但这些是否能构成“农民起义说”立论的确据，仍然有慎重商榷的必要。且不说施耐庵是否有可能用阶级观点做文章的可能，也不谈江湖好汉被“逼上梁山”是否有“权居水泊，专等招安”的权宜之计，更不提宋江们是否具有农民起义必须具有的土地、政权要求，仅此“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只反高俅、童贯，忠于大宋天子一条，就足以动摇“农民起义说”的根基。在笔者看来，《水浒传》所着力描写的是内忧外患的历史